

兩個 現代精神 的 出路

林國源

「史特林堡與梵谷」一書之評介

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之為存在哲學的傑出倡導者是衆所皆知的，他早年為一位精神病醫師，寫過「精神病理學總論」與「世界觀心理學」，在精神治療方面的心得與對人類性靈的慧觀，乃其所提倡存在哲學的主要淵源之一，與後來海德格等所持

的存在分析相映照，則雅斯培所見實有開風氣之先及不謀而合之處。

這本「史特林堡與梵谷」即係雅斯培寫作「世界觀心理學」(1925)之前所作的精神病理分析報告的一部分。他既平行又對比地寫出現代戲劇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948-1912)、見靈論者史維登堡(S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神秘詩人赫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與現代畫家梵谷(Vincent van Guegh, 1853-1890)等人的精神病理分析與比較，最後則點出一般人對神話、夢、童心、及精神病之間具有共通性——即創造力——的誤解，提出他本身對精神分裂症與創造力二者間相關性的看法，而對一九一二年間風行歐洲的表現主義藝術浪潮則頗有微詞，因此，自精神分裂症與現代文明之間的關係加以駁論。雅斯培認為：精神病患可以是偉大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即係他精神的避雷針，他的生命力儘管理路欠清，却能激越地昇華到更高層次的存在；但一味模仿精神病患的正常人則不足一哂，那種裝瘋賣傻的行徑實在不能算是現代人的境界。這也許就是雅斯培出版這本分析報告的真意所在吧。

筆者就讀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戲劇組期間，爰師長的啓發，對精神兩度失常的瑞典現代戲劇大師史特林堡及其卷帙浩繁、磅礴深刻的作品極度入迷。撰寫畢業論文「史特林堡：『夢幻劇』研究」時，於結論章節即自史特林堡的精神病理分析論「夢幻劇」的悲劇觀，並憑以管窺西方現代精神的危機。本書即筆者撰寫「史特林堡的精神分析」一節的重要參考書之一。

雅斯培告訴我們：「坦白承認，對史特林堡這個病例，我只對其精神治療及其心理特質等方面感興趣，其他則並不在意。而梵谷最吸引我的，則是他整個人生哲學與現世態度，特別是他精神分裂期間所呈現的整個世界。」因此，對本書的兩個焦點——史特林堡與梵谷，

前者他雖以全書一半的篇幅加以討論，但只就其精神病理分析與世界觀的發展二方面深入披陳，對他的作品則簡略帶過，稍嫌語焉不詳；對於後者，雖只花費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却詳盡地自「梵谷書簡集」之中找出梵谷精神病理分析的依據，言其創作張力的變化、自我分析的變化，作品的特質，與其病識及臨對態度等方面的真相。因此，筆者在此擬一談史特林堡作品的內省性格，即從他的作品中找出二條線索以與他二次精神異常的經驗——嫉妒妄想症與被害恐懼症——相印證；其次，雅斯塔培給梵谷的診斷是精神分裂症而非癲癇症，筆者亦試着加以討論，因為根據當時醫師的診斷與後來研究的看法正好與雅斯塔培的診斷背道而馳。

史特林堡早期的自然主義戲劇大抵與他對女性主義的嘲弄與第一次婚姻經驗有關，我們可以循「史特林堡的兩性觀」這一線索去探討；他後來所謂夢幻形式的戲劇則大抵與他精神狀態重獲平衡的藉力——史維登堡的見靈論與人間地獄觀——有關，我們可以循「史特林堡的宗教觀」這一線索去披尋。早期的劇作，如「伴侶」中女性想壓倒男性，結果適得其反；「茉莉小姐」中要女兒不讓鬚眉的教養方式；「冤家債主」中席克拉克欠了前夫與當時丈夫的感情債却仍自以為是，凡此都迴映了他對女性主義的嘲弄（但却不是反女性）；「父親」中疑心太太不貞，孩子不是他的親骨肉，這是史特林堡「嫉妒妄想症」最為露骨表現，「結」則是孩子監護權之爭，兒女是兩性之爭的死結，不論是分是合都解不開的死結。後期的劇作中，如「到大馬士革」三聯劇，「罪大惡極」、「主顯節」、「復活節」、「死亡之舞」、「夢幻劇」等，主題大抵以印證心路歷程為主，自舊約的「罪與罰」轉為新約的「愛與諒」的脈絡是很明顯的。歸結而言，男性必須備受女性的百般折磨，最後斷念、默認、尋求救贖，「自最高的歡樂帶來最大的痛苦，復自最大的痛苦中產生最大的歡樂」，這就是從「色慾之愛」到「性靈之愛」的環扣。一股神秘的勢力在冥冥中追討着他，這就是他被害妄想症後來

所具現的形而上的意含，後期劇作中更直接見之於行文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早期的劇作多採時空集中的形式，甚至集中到單幕的極端；後期則採時空延展的形式，場景轉換頻繁，乃至模擬夢之不相連貫的極端。如此說來，雅斯培說史特林堡的世界觀有所轉變，這一轉變只改變史氏劇作的內容，而形式則未見蛻化的痕迹，這一看法實大有值得再加商榷的餘地。

雅斯培認為替梵谷看病的醫師診斷他患的是癲癇症沒道理，因為他沒有癲癇症的症狀，也沒有特殊的癲癇性痴呆。閔寇夫斯卡 (F. Minkowska) 則認為梵谷渴求愛情，宗教心濃厚、堅定，有夢遊症傾向，他的性格是癲癇質的。依雅斯培之見，梵谷「傾向孤癖與隔絕，同時又渴望愛與友誼」。這種雙重性格如能適當調適則為一般正常的現象，但如面臨環境的壓力，無法持平，則精神狀況就會出麻煩。筆者認為，自一系列梵谷自畫像觀之，眉頭深皺，兩眼炯炯，他在烈日下狂熱作畫，焚燒自己；他夜裏拿刮鬚刀衝着高更，隨後却退縮，暴戾地割下自己的右耳，他舉槍向嘉塞博士（梵谷的主治醫師），再頹然作罷，反而回去指着自己的胃部開槍。以上的情況，似乎有躁鬱症與妄想症的痕迹。又，雅斯培指出梵谷有梅毒後遺的麻痺症，例如後來作畫時畫筆從指間滑落。總之，性格的基質與患精神病不能混為一談。因此，譯者還是接受雅斯培的看法，梵谷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〇年間是患了精神分裂症。

與史特林堡平行的病例史維登堡，與梵谷平行（世界觀則為對比，一現世、一形而上）的赫德林，這二位在國內讀者的心目中也許較為陌生，但在西方思想史上與德國近代詩壇上則有其憂憂獨造的地位，爰為簡要的介紹。

史維登堡為瑞典科學家與見靈論者，早年對科學卓有貢獻，任皇家礦物局顧問三十年，在學理（數學、天文等）與實際方面（造船、飛船等）均多所發明，著作等身。一九四三年

以後則抱持見靈論，辭去一切科技方面的職務，專志撰寫神學著作。他以「靈媒」自居，自謂親蒙上帝與天使的眷顧，能直接與靈界交通。他死後，世人成立新耶路撒冷教會，此派勢力雖小，但分支遍及全世界。在文學方面，他的思想對布烈克、巴爾扎克、福樓拜、波特萊兒、葉慈、與史特林堡等高度想像力的作家有深遠的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見靈論，是史特林堡精神分裂症後來尋求康復的主要藉力之一。

赫德林為德國詩人，新希臘主義者，有德國「希臘詩人」的美譽。早歲與詩人席勒交遊，譯希臘悲劇與詩篇為德文，後神遊希臘，竟至以希臘與諸神為真實，淪於精神分裂以終其一生。他的詩可以說是「破格之作」，如果衡之以古典主義的標準，則顯然不是上乘之作，但批評的基準到了現代起了異變，所謂歧義與變位的偏好使得赫德林詩作的身價異於他在世之時，因此，雅斯培認為，黑林格拉斯（V. Helingrath）指赫德林一八〇一至一八〇五年間的詩作為他作品的「中心，核心，與高潮；實際上即他的聖言」自不足為異了。

精神病與創造力之間並沒有充分的相關性。猶大在一九四九年研究了二九四位藝術天才與科學天才，經十七年深入探究他們的遺傳與身心各方面的因素，得到的結論是：「支持天才與瘋狂相關這一假定的證據並不存在。」（見韓幼賢：「變態心理學與現代生活」一書，頁七）。精神病患有創造力，並非指患了精神病即可以平白得到創造的靈感與手法。依雅斯培之見，所謂「疾病去除壓抑，潛意識浮現，文明所加諸的障礙一旦解除，即迸發出激昂的生命力與跳躍的創作火花，此與夢、神話、童心是一脈相通的」這種說法為一種誤解，將問體簡單化了，並不能適用於所討論的幾位病例。「天才意氣風發地為他自己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就在那裏頭成長，精神病的天才也為他自己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但他却在那世界中被毀滅自己。」遽予認為精神分裂症乃作品創造的條件，實不免有過於武斷之嫌。

筆者認為，精神病患的作品並非所謂病患文化的徵兆。雅斯培即指出：「一九一二年，我至哥洛紐（Lologne）看畫展，當時表現主義正席捲全歐，滿街都是『梵谷』，我由衷感到，只有梵谷才是真正偉大而實非心甘情願的『精神病患』，唯有他鶴立雞羣，而其他人儘管一時裝瘋賣傻，却再正常不過。」照雅斯培之見，藝術創作是梵谷的精神的避雷針；梵谷是真切地在表露他內心的世界與對外在世界的悲憫，這就是他繪畫創作的真實性；其次，他孜孜不倦，將全副心力投入繪畫創作，在技法上獨出機杼，此則為他在形式方面的原創性，這正是梵谷之為偉大藝術家的偉大處。而反觀喧嚷一時的表現主義浪潮，他們的作品既無真誠性（無病呻吟是也）也無創造性（多為嘩眾取寵的噱頭），他們一味模仿精神病患，發為無謂的夢囈，故意呈現精神分裂的性格，無非矯揉造作罷了，這才是不值一哂的西方文明末流的病態文化！這正是雅斯培刻意加以針砭，痛心開鎖定劑的癥結所在。

我們都知道，雅斯培深受齊克果與尼采的影響，他在本書中所討論的四個人物，他們的作品都含有內省的成分，都富含追尋內在自我，真實存在的色彩。如果說，齊克果預示了現代人的心性與困境，尼采迴映了現代西方的精神危機，則雅斯培在本書中所論列的正是存在分析的典範，點出現代精神的出路。按存在分析為海德格等將存在哲學與精神分析匯合而成的一個流別，即以存在哲學為根基的精神治療，對精神病患的治療不在於消除潛意識的障礙，而是徹悟內在的自我，去尋求最真實的存在。從這點來看，史特林堡雖罹病却重獲平衡，後來且寫出一系列極富原創性的劇作，史維登堡的見靈論使他在中年以後的性靈得以發抒，赫德林與梵谷最後雖淪為精神分裂的犧牲者，但他們的作品之創作則為他們精神的避雷針。可以這樣說，值得我們追尋的是一個可供我們性靈成長的境界而非一個導至自我毀滅的絕境，這或許就是西方現代精神危機的一個出路吧。